

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

宋人著作五種徵引
《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袁傳璋 著

中華書局

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

宋人著作五種徵引
《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袁傳璋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袁傳璋著. —北京:
中華書局, 2016.6

(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

ISBN 978-7-101-11907-7

I. 宋… II. 袁… III. ①中國歷史-古代史-紀傳體②《史記》-研究 IV. 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25853 號

書 名 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著 者 袁傳璋

叢 書 名 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

責任編輯 樊玉蘭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2 $\frac{1}{2}$ 插頁 2 字數 295 千字

印 數 1-2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1907-7

定 價 38.00 元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資助項目



序

西漢時期司馬遷撰著的《史記》面世之後，自漢至唐，為這部歷史名著作注釋的各家之中，最著名的有三家，即劉宋時期裴駙的《史記集解》、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與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宋代人將這三者合刻為“三家注本”，成為《史記》最通行的有注釋的讀本。自那之後，“三家注”中的《正義》沒有以單刻本的形式流傳下來，一般的讀者只是通過“三家注本”了解其內容。二十世紀前期，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在日本古活字本《史記》欄外標注中發現了《正義》的大量佚文，並徵引在他所編撰的《史記會注考證》中。瀧川資言發現的這批佚文，究竟是否可靠？如果可靠，其價值又如何？國內學者對此一向有不同的看法。

袁傳璋教授《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一書的第一個貢獻，就是從總體上解決了《史記正義》真偽問題的學術疑案。這部書從呂祖謙、王應麟、胡三省等人的五種著作徵引的將近一千一百條《正義》中輯錄出三百九十四條《正義》的佚文，其中有相當部分與瀧川資言所輯的佚文可以互相發明，這說明《史記會注考證》中的《正義》佚文總體上是可靠的。

這部書的第二個貢獻，是豐富了我們對於《史記》“三家注本”形成過程的認識。首先，以往我們認為，南宋人在合刻“三家注”的

時候，主要就是把《正義》中與《索隱》文字重複、內容近似的部分刪除。袁傳璋教授在比對大量佚文的基礎上指出，“三家注本”對於《正義》的處理方式，不僅有刪削、合併，而且有移置，甚至還存在增益的情況。其次，因為“三家注本”移置了《正義》的文字，有時誤置於《索隱》之下，從而給人造成《正義》是配合、疏解《索隱》的錯覺。而實際上《正義》與《索隱》是各自獨立、互不稱引的。其三，呂祖謙、王應麟、胡三省等著名史家大量援引《正義》的事實，又可以說明這些佚文本身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不是冗餘、重複的文字。

通過袁傳璋教授的工作，我體會到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我們不僅要注意發現“新材料”，更要善於在常見的書中發掘有價值的資料（我們姑且把這種發掘稱為史料的“再發現”）。我們說的“新材料”主要指的是出土文獻、海外所藏的中國古籍與漢文文獻，也包括近年來在古籍普查、古書拍賣過程中發現的一些以前不為人知的珍本秘籍。但新材料畢竟不常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還是要靠對既有資料的再發掘。而且新材料是否可靠，價值如何，常常也需要和既有材料比對之後，才能下結論。袁傳璋教授在本書中使用的宋代三位史學家的五種著作，都是比較常見的書，其版本也很普通，有的甚至就用了《四庫全書》本。這說明利用常見的書，一樣可以做高質量的研究。

以程金造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曾認為《史記會注考證》中的《正義》佚文，可靠的只有十之一二，其餘多數是日本人讀書時留下的批注。這個結論顯然受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風靡學界的“疑古”思潮的影響。儘管現在回過頭來看，程金造先生懷疑過度了；但我們認為，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謹慎的懷疑要比輕易的盲從好。因為懷疑的結果將促使我們去做更紮實的研究。袁

傅璋教授做的這項工作，其方法就是傳統的輯佚學，但是他得出的結論，實際上也有助於我們在文獻學領域“走出疑古”。這說明傳統的古典文獻學方法，一樣能解決“前沿”的問題。

我還想在袁傳璋教授這部書的基礎上，談一個相關的問題。既然現在發現了數量這麼多的《史記正義》的佚文，且是可靠而有學術價值的，那麼在今後的古籍整理工作中，主要是在整理《史記》的過程中，要怎麼對待這些佚文呢？

近年中華書局啟動了“二十四史”點校本的點校修訂工作，在討論《史記》修訂凡例時，曾有學者提議，應當利用修訂的機會把已發現的《史記正義》的佚文輯補進去。這個建議看似很有道理，但其實大家讀了袁傳璋教授的書以後，會更加意識到，“三家注本”不是簡單的“三合一”，它有一個形成過程，傳到今天的“三家注本”已經是一個歷史存在了。如果輯補了《正義》佚文，就不是歷史上的“三家注本”了，等於舊本子沒整理好，又出了一個新本子。而且從操作的層面看，袁傳璋教授僅從五種書中就輯出了大量的佚文，我想一定也還有其他一些佚文散在他書之中而還沒有輯出來的。這樣一直輯下去，一時半會兒是輯不到頭的。因此後來中華書局新修訂點校本《史記》時，並未把輯補《正義》列入其中。如果有讀者出於研究需要，希望能多了解一點《史記正義》的內容，目前除了可以讀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以及水澤利忠的《史記會注考證校補》），還可以把張衍田教授的《史記正義佚文輯校》與袁傳璋教授的這部書結合起來讀，那麼《正義》的基本內容也就可以掌握了。

袁傳璋教授是當今研究《史記》學者的傑出代表人物。他治學功力堅實而深厚，學風樸實而純正，長於發現問題，論述多有創新，而且為人正直、厚道，頗具大家風範。他的為人、他的學風，將同他

的這部《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一起，成為當代《史記》研究者的典範。

安平秋

2016年3月於北京大學

前 記

《史記》有三家注：劉宋裴駟《集解史記》取合本子注體式，合《史記》本文與裴氏注義為《集解》八十卷；李唐司馬貞《索隱》與張守節《正義》依傍《集解》，標字列注各為三十卷，原不與《史記》本文相附而單本別行。司馬貞與張守節生當同世而略有後先，為《史記》作注的底本同為裴駟《集解史記》，徵引的典籍文獻同出唐室館閣祕書，雖各自為書不相為謀，但為同一事典作注時因引據同源，注文往往相同或相近。宋人合刻三家注時，以先刻行世的《集解》《索隱》合刻本為本注，而以《正義》為增注附刻其後，凡《正義》注文與《索隱》相同或相近者，為免複重，或逕自削除，或予以刪節。自《史記》三家注風行於世，單本《正義》遂漸次湮沒，明人已無緣復睹《正義》全貌。

《史記》古注三家，唯有張守節《正義》未能完整流傳，大量遺佚，對於《史記》研究者而言實為憾事。百餘年來，中外數代《史記》學者對此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使得《史記正義》佚文的輯證工作越來越精細，對於《史記》本文的解讀、三家注的關係研究等也起到推動作用。

筆者與日本學者小澤賢二先生合作推出的“史記正義佚文輯證”系列，包含《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唐張

守節《史記正義佚存》、《史記正義佚存訂補》三部書。本系列是迄今為止輯得《正義》佚文最全（共計兩千零六十八條）、對其來源與真偽的考論亦頗矜慎的兼具資料性與研究性的學術著作，於學者研究《正義》的存佚、《正義》與《集解》《索隱》的關係，以及推進司馬遷與《史記》研究的深入，或可作鋪路的燕石之用。

由筆者所撰《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是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本書對宋人呂祖謙撰《大事記解題》、王應麟撰《玉海》《通鑑地理通釋》《詩地理考》、胡三省撰《新注資治通鑑》五部著作徵引的《史記正義》佚文進行輯佚與研究，希望能夠有助於對《史記》文義的深入理解。通過比對考察，發現合刻本中附刻的《正義》，其實是經過宋人合刻者大幅度的整合重編後，以削除、刪節、合併、拆分、移置等多種形態呈現於世的，已大失張守節《史記正義》寫本舊貌。因此，研究張守節《史記正義》對《史記》的重大貢獻和學術成就，不能僅據今本《史記》三家注所收的經過宋人合刻者刪削重編的五千三百一十五條《正義》條文，而應集合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小澤賢二《史記正義佚存訂補》三書新增《正義》佚文一千六百七十四條，加上本書新近從宋人著作五種中輯出的三百九十四條《正義》佚文，做通盤的點檢。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佚存》的主體是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手澤影本及其錄文（小澤賢二整理）。這部手稿由瀧川資言先生過錄自日本東北大學所藏《史記》古活字印本的欄外標注，以後又參照所見多種《史記》古版本、抄錄本的校記比勘校正，留下許多塗抹、添注的痕跡，極具研究價值。瀧川資言先生的手稿由小澤賢二先生捐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幸遇中華書局鼎力翼贊的機緣，方得以將此珍貴手稿以影本形式首度公之於世。手稿字

跡較為繚亂，偶有漫漶，釋讀難度較大，小澤賢二先生在整理過程中付出了很大心力，最終呈現出這樣一部對《史記正義》佚文研究非常重要的文獻。該書收入筆者所撰《〈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佚存〉手稿之文獻價值》一文，為讀者介紹相關背景，概述其學術價值。

小澤賢二先生所著《史記正義佚存訂補》，共收錄《正義》佚文一千六百七十四條。小澤氏費十餘年之功，遍訪日本公私所藏宋元明版《史記》、朝鮮及日本古活字印本《史記》欄外標注以及《史記》古抄錄本，仔細校覈瀧川資言、水澤利忠所輯得的《正義》佚文，一一注明出處，並在《史記正義佚存訂補·解說》中對日本學者所輯《正義》佚文的來源與傳承做了細密的考證。

筆者資質魯拙，研習《史記》雖過半個世紀，然迄無所成。唯稍感自安的是既不屑追風媚俗，更不敢曲學阿世。學術研究的要義是即實事以求真是。評判學術問題的是非，亦應有同一的標準，而不應隨心所欲，予智自雄。在古書字義的訓釋上，務須兼顧本義、引申義、前後語境及作者與注者的時代特點，而不可固執一見，不及其餘。《史記》中有些含義深永的文句，若欲得其正解，不僅要結合上下文的語境，而且還需通觀全篇細加揣摩，有時甚至要從全書主意通盤打點。學術乃人類之公器，其進步亦需人類共同之努力。既不可黨同伐異，也不應區分此軫彼域。作為全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史記》，其博大精深，難見涯涘。對它的求解，尤需各國的《史記》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協作切磋。誰在學術上取得突破，不管他來自司馬遷的故土，還是遠自異域，都應以平常的心態表示敬意。這幾年筆者做“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研究”課題，也秉承以上的原則努力踐行，但做到怎樣的程度，還存在哪些謬誤，則衷心期待讀者諸君的檢驗與批評。

感謝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宋人著作五種

徵引《史記正義》佚文研究”課題因爲得到委員會專項基金的資助，才得以順利進行。感謝中華書局慷慨接納“史記正義佚文輯證”這樣選題冷僻的書稿，並有幸忝列“點校本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使它有機會面世。感謝安平秋教授在百忙中審閱《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書稿，並惠賜序文，提出切中肯綮的批評與誠摯的鼓勵。

日本史記正義研究會主幹小澤賢二先生，經常惠贈珍稀的文獻資料，對本書中的每篇文稿不僅通過電子郵件與我往復討論，而且還三次光臨寒舍與我切磋琢磨。在此向他敬致謝忱！

袁傳璋

2014年7月10日

於蕪湖鳳凰山下麻陶齋

目 錄

序(安平秋)	1
前 記	1
導 論	1
一、《史記》三家注簡說與張守節事歷鉤沉	1
二、合刻本對《正義》的刪削與日本學者的輯佚	4
三、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概述	8
四、《括地志》與《史記正義》關係之探究	14
五、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之文獻價值	19
第一章 《大事記解題》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35
一、引言	35
二、《大事記解題》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38
三、《大事記解題》徵引《史記正義》佚文的價值	85
第二章 《玉海》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93
一、引言	93
二、《玉海》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97
三、《玉海》徵引《史記正義》佚文的價值	137

第三章 《通鑑地理通釋》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149
一、引言·····	149
二、《通鑑地理通釋》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151
三、《通鑑地理通釋》徵引《史記正義》佚文的價值·····	207
第四章 《詩地理考》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219
一、引言·····	219
二、《詩地理考》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221
三、《詩地理考》徵引《史記正義》佚文的價值·····	239
第五章 《新注資治通鑑》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247
一、引言·····	247
二、《新注資治通鑑》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250
三、《新注資治通鑑》徵引《史記正義》佚文的價值·····	284
附錄 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輯存·····	295

導 論

一、《史記》三家注簡說與張守節事歷鉤沉

趙宋王朝以前學術價值最高的《史記》古注共有三家，即南朝劉宋之裴駙《集解史記》、李唐王朝之司馬貞《史記索隱》與張守節《史記正義》，經宋人合刻而流傳至今。裴駙以東晉徐廣校本爲本，“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又“時見微意，有所裨補”（《史記集解序》），爲《史記》一百三十篇作注，仿魏何晏《論語集解》、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及其父裴松之《三國志注》注例，隨文施注，取合本子注體式，合《史記》本文與裴氏注義爲一體，爲《集解史記》八十卷。此前，《史記》或有本無注，或有注無本。自裴駙書出，《史記》方有注本行世。裴氏本亦爲後世所有注本所從出。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殿刻三史，《史記》即取《集解史記》八十卷爲底本而按《史記》篇名析爲一百三十卷。裴駙對《史記》的廣泛流行居功至偉。唐玄宗時成書的司馬貞《史記索隱》與張守節《史記正義》，均依傍裴駙《集解史記》，仿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標字列句爲注之例，各爲三十卷，原不與《史記》本文相附而單本別行。

司馬貞在裴駙《集解史記》的基礎上，“探求異聞，采摭典故，解

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又重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史記索隱序》)，“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史記索隱後序》)，於《史記》義蘊探尋頗多發明。其健於辯駁的文風又與宋人喜尚譏評的學風契合，故“近代號爲奇書”^①，而以“小司馬史記”名義與“小顏氏漢書”並稱，備受推崇。宋時不僅有多種單刻本《史記索隱》行世，而且將《索隱》附刻於《集解史記》而成《史記集解索隱》二家注者亦有數本。故《索隱》舊貌至今猶存。

《史記正義》的作者張守節，舊、新《唐書》無傳，生平事歷闕如。但據其上呈《史記正義》所署官銜及相關唐史文獻，尚可推知其生平學養之大概。張守節自敘云“涉學三十餘年”而撰《史記正義》，於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殺青斯竟，則其時必在五十五歲上下。由此年上推，當生於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前後，較司馬貞晚生十年左右。張守節官任“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爲大唐太子東宮屬官。《新唐書·百官志四·東宮官》：“侍讀，無常員，掌訓導經學。”東宮設有作爲太子學館的崇賢館(後避太子李賢名諱，更名崇文館)，置學士、直學士，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自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設館起，便集中了大批博學通儒，如孔穎達、劉伯莊、王元感、李善、褚無量、劉知幾、張嘉會之輩，使東宮成爲李唐王朝的學術文化重鎮。在崇賢館就讀的太子、諸王，要修習五經(《易》、《書》、《詩》、《左氏春秋》、《禮記》)四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必“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粗解注義”方爲及格。“掌訓導經學”的侍讀則須經明行修、史學嫻熟。如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太宗詔爲晉

①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蒙古中統二年平陽道段子成刊本《史記集解索隱》卷首董浦《序》。

王(李治)授經講業”,及晉王爲太子,德言“仍兼侍讀”^①;許叔牙“少精《毛詩》、《禮記》,貞觀初累授晉王(李治)文學兼侍讀”^②;李敬玄“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後“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③;褚無量“勵志好學,尤精《三禮》及《史記》,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李隆基)侍讀”^④。由以上任職侍讀者資歷學養例之,張守節被遴選擔任諸王侍讀,其經史學殖之富自可想見。

張守節撰著《史記正義》,得益於他擔任東宮學官所處的優越學術環境。大唐東宮學館由名家講授《史記》、《漢書》淵源有自。高宗龍朔(公元661—663年)中,劉伯莊以弘文館學士國子博士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世,奉詔講《史記》;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史記》,司馬貞曾“少從張學”(《史記索隱後序》);而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多次稱道“張先生”、“張先生書”,可證張守節亦師從張嘉會受《史》、《漢》;褚無量兼崇文館學士,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張守節作爲東宮學官,有幸自青年時代起,得依崇賢館《史》、《漢》名師門牆。東宮有司經局,掌四庫圖籍繕寫刊輯之事,安史之亂前,經籍圖書典藏極富。開元初,褚無量奉詔校理內府書,玄宗曾令其借崇賢館藏書抄寫以補充內府書。開元六年冬,玄宗自東都洛陽還駕京師長安,詔令將經過校理的東都乾元殿圖書遷“於京大內東宮之麗正殿安置”^⑤。玄宗開元七年設麗正殿修書院,“令麗正殿寫四庫書,

①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蕭德言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第1版,第5653頁。

② 《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許叔牙傳》,第5654頁。

③ 《新唐書》卷一〇六《李敬玄傳》,第4052、4053頁。

④ 《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下·褚無量傳》,第5689頁。

⑤ 《玉海》卷一六七引韋述《集賢注記》,元至正十二年慶元路阿殷圖塾堂補刊本。